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Ethnohistor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4-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 海濤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8992

二战后历史人类学(ethnohistory)¹⁾在美国学界的兴起 The Emergence of Ethnohistor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刘 海涛

LIU Haitao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Based on related western documents,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emergence of ethnohistory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reveals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provides a new clue to study and analyze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1) After a long period of gest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ethnohistory, a special form of western history anthropology,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2) The emergence of ethnohistory indicated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anthropology (ethnology) and history, and also explained that there is a complementary possibility between them. Related researches of ethnohistory at that tim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rchival resources,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archival evidence provided by non-indigenous people. In addition, owing to the lack of close organizations and discipline norms, it was rarely regarded as a research direction with a bright future and also was not recognized especially by some historians at that time. 3) The rise of ethnohistory reflect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t the beginning,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window through which the early form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an be seen clearly.

序言

“二战后的若干年中，作为一个学科性研究领域的历史人类学(ethnohistory)出现了。其专业范围主要限于美国，目光锁定在北美土著上，在1950年代开始广泛实践。后来，随着结构主义的衰落、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充、概念视野比博阿斯学派还要宽广”(Faubion 1993)。事实上，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领域，而与民族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民族学发端的19世纪，一些学者就开始利用档案证据来帮助解释民族志或考古学材料，即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的最早“身影”(Lurie 1961)。二战前，从整体来看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

土著历史都不太感兴趣。因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而小规模族群社会也不是当时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空间，导致二战前历史人类学一直发展缓慢、影响微弱（刘 2013a）。

二战后至1970年代，历史人类学日渐兴起于美国学界，与战后国际形势及美国国内社会条件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与美国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在战后关系的改善、互动、复交、契合（reapproachment）以及日渐合流（convergence）息息相关，与整个西方学界的新变化相辅相成。1946年《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法案》（Indian Claims Commission Act）在美国国会的通过和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Indian Claims Commission）的建立始于1953年，与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密切相关，由美国司法部和印第安纳大学合作的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the Great Lakes—Ohio Valley Research Project）及后续计划的出台，成为历史人类学战后凸显于美国学界的直接诱因。它们激发了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事印第安历史研究的热情，也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创造了初步合作的机会，还由此找出并累积了大量有关印第安人历史的档案材料（刘 2012）。

就目前国内学界而言，对逐渐端倪于美国学界的历史人类学关注不够，对历史人类学兴起于美国学界的具体表现缺乏深入了解（刘 2009）。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揭示，以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人类学及其发生发展的学术脉络。作为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和具体表达方式，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发端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讲，专题研究历史人类学兴起于美国学界的具体表现，对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肇始而言有着重要助益。可以说，考察二战后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兴起是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路径与窗口。

西方历史人类学是一种复杂、流变的学术现象，如何把握它取决于认识它的具体视角；在对它进行不同角度的多重剖析之后，才有可能将其来龙去脉、内涵及特点揭示出来，进而形成对它的整体认识，逐步实现对这种复杂的流变的学术现象的把握。长期以来，世界史学者，如国内学者荣颂安、陈启能、张广智、杨豫等，多从某一流派（如法国年鉴学派、美国文化史学派、英国社会史学派）的角度来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这是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一条主要路径；而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如国内学者庄孔韶、黄应贵、王铭铭、张小军、蓝达居、刘永华、林富士、刘海涛等，国外学者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等，则多把“西方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叙事对象加以研究，这种路径也是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维度。“西方历史人类学这种具体的活生生的学术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兴起年代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历史学和人类学是如何具体结合的？倡导人是谁？组织机构是什么？理论方法有何具体展示？”若要回答此类问题，有必要从国别的角度进行实然性的历史考察，揭示出它的具体的实然存在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别”路径，是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维度。另外，作为一种复杂流变的学术现象，西方历史人类学在不同的国家学术传统之中，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可以说，西方历史人类学既有整体意义上的共性，也有不同国度的特殊性、具体性。深入某一具体国度来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可为整体认知西方历史人类学提供个案基础。事实上，“国别”路径是研究西方历史

人类学难以绕开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本文就是基于上述思考展开的，突出展示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国别”研究路径，是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理论流派”路径、“整体叙事”路径的一种重要补充。

如前所述，与《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法案》和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密切相关的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及后续计划的陆续出台和实施、是1950年代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得以凸显的直接诱发因素、事实上、也是历史人类学兴起于美国学界的重要表现之一。此外，西方学者、如沃格林 (Erminie W. Voegelin)、达克 (Philip Dark)、多宾斯 (Henry F. Dobyns)、尤勒 (Robert C. Euler)、多尔森 (Richard Dorson)、沃什布恩 (Wilcomb Washburn)、贝雷斯 (David Baerreis)、卢里 (Nancy Lurie)、利科克 (Eleanor Leacock)、尤尔斯 (John C. Ewers)、瓦伦丁 (Charles A. Valentine)、阿克斯特尔 (James Axtell)、芬顿 (William N. Fenton)、特里杰 (Bruce G. Trigger)、科恩 (Bernard S. Cohn)、斯特蒂文特 (William C. Sturtevant) 等对历史人类学概念诠释的系统化、集中化与不断扩展及深入 (刘 2011)，也是这种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更为突出的表现是这一时期还创办了历史人类学专业学会和期刊，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历史人类学的经验研究相比二战前有了新的变化。可以说，无论从组织基础的形成、宣传窗口的确立、主要阵地的出现来看，还是就研究方式的革新而言，都标志着二战后一种新的具有一定规模且自成体系的学术现象——历史人类学已经雏形初具，给美国人类学界及史学界带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突出表现进行系统揭示。

1. 历史人类学专业学会的组建

跨学科研究在战后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历史学界有了迅猛发展。1945年、由民族学家芬顿 (William N. Fenton) 在非正式意义上来主持的易洛魁 (Iroquois) 研究跨学科委员会成立 (Jennings 1982)。1951年时在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 (the Newberry Library) 任职的历史学家帕盖利斯 (Stanley Pargellis) 召集了一个有关印第安事务的会议。会议于1952年3月29日在纽伯里召开。与会代表有年龄上的考虑，并不只是有意在人类学、历史学领域中挑选。许多历史学家是年长的学者，主要工作由他们完成；许多人类学家与这些历史学家相比相当年轻，其中包括沃格林 (Erminie Wheeler-Voegelin)、芬顿 (William N. Fenton) 和华莱斯 (Anthony F. C. Wallace) 等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在会上华莱斯指出，如果每一个学者都能互相学习，展示跨学科的成果，那么这个时代就能很好度过。这种基本原则得到大多数与会学者的承认。尽管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美国印第安人，但其探讨的倾向性在严格意义上讲是方法论问题，即不同学科如何展开研究才能互补和彼此刺激 (Jennings 1982)。以更为严肃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的，是1953年2月19日在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召开的关于早期美国印第安和白人关系的会议。其中，专门讨论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理解印第安文化、要从印第安人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印-白关系，既要有自己的角度，也需要“他者”的知识；既需要自己的方式，也需要“他者”的方式。与会者有卡彭 (Lester Cappon)、芬

顿、沃什布恩 (Wilcomb W. Washburn、时任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研究院的年轻研究人员) 等学者。沃什布恩后来成为史密森研究院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美洲研究 (American Studies) 的主任。这所研究院拥有全美人类学档案馆还拥有大量民族学方面的收藏品 (沃什布恩 1997: 8)。这些人物陆续在跨学科研究领域登场并发挥重要作用 (Jennings 1982: 22)。

历史人类学专业学会的最初形态“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 (Ohio Valley Historic Indian Conference、OVHIC) 的成立则主要得益于上面述及的战后美国学界, 尤其是历史学界、民族学人类学界强调跨学科发展的整体学术氛围。

“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的成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51年、授权俄亥俄州考古学和历史学学会 (Ohio State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董事会组建了“俄亥俄历史中心” (Ohio History Center)。由于资金缺乏, 该中心并没有按计划运作。但是, 相关研究因此得以展开, 一些基础性的档案材料开始收集。第二阶段: 1953年5月7日、在伊利诺伊州博物馆 (The Ohio State Museum、博物馆具体地点在伊利诺伊州的乌尔班纳) 召开会议, 对因鉴定“历史上印第安族群及其史前古器物”研究项目而设立研究计划和组建相关学会的可行性进行论证。会上学者们对如何组建这样的学会存在较多分歧。最后他们达成决议, 即由来自俄亥俄流域各州的对此感兴趣的学者组成委员会另行开会, 为这类学会的创建进一步营造基础。由此, 在俄亥俄首府哥伦布组建了一个地方委员会, 成员主要来自俄亥俄州考古学和历史学学会、俄亥俄州立大学等的相关教职人员。他们与会的日期, 也就是“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第一次会议的时间, 即1953年11月19-21日。人员得到通知的同时, 会议开始计划与筹备²⁾。与会地点仍为伊利诺伊州博物馆³⁾。1953年11月21日、会议组委会通过了章程, 将该组织命名为 Ohio Valley Historic Indian Conference (“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同时, 阐述了其宗旨和目的——鼓励俄亥俄流域的印第安历史研究, 交换信息, 召开定期会议, 解决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研究中展开相关学科的合作⁴⁾。自此, 即1953年11月21日、“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在伊利诺伊州博物馆正式成立。该协会是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之间的一种跨学科组织, 目的在于促进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研究 (Brown 1991: 120)。

1953年11月21日在成立大会上, 沃格林、史密斯 (Dwight L. Smith) 等是与会者当中的重要成员。大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即期待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在印第安历史研究中加以合作。沃格林被推选为协会主席, 史密斯成为执委会成员。该次会议的成员几乎都是印第安人权利申诉案例 (the Indian Claims Cases) 研究中那些小圈子里的学者 (Jennings 1982: 22-23; 刘 2012: 49-68)。

作为“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的重要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 美国女人类学家沃格林为协会成立发表了主席宣言。在宣言中、她乐观评价了日渐凸显的历史人类学及其学术组织——“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 “当时, 职业历史学家对美国印第安人缺乏兴趣, 民族学家对美国印第安族群的档案史研究也漠不关心。有民族学思想的历史学家不多, 同样有历史学思想的民族学家也不多。缺乏的原因是一样的, 即美国印第安族群的档案研究没有得到民族学界的鼓励, 而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学研究在历史学界也十分勉强。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一方面存在很多空白,

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积极投身其中。大约50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参加了‘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的筹备会议和活动，为历史人类学成为一个为大家认可的特殊学术领域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他们都期待该协会能够成为一个特殊的组织，历史人类学能够成为一个拥有新的学术增长点的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已经为该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当时历史人类学还没有被任何特殊的组织所代表。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的成立弥补了这一缺憾，令人欢欣鼓舞，预示了历史人类学美好的未来” (Voegelin 1954a: 1-3)。

1954年11月该协会移师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第2届年会，印第安纳大学也由此成为历史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中心⁵⁾。自此直到1960年代中期，印第安纳大学一直是历史人类学的大本营。这次会议、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来自俄勒冈、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印第安纳的48名专家主要将目光锁定在“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研究”上。有关会议的时事通讯 (newsletter) 则成为1954年 *ethnohistory* 期刊第1卷中的重要作品 (Tanner 1991: 65)。

1956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第4届年会上，学者们提出要扩大印第安历史研究的领域，并相应将原来的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更名为“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 (AIEC)。由此，1956年历史人类学专业学会的一个中间形态、即“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 (AIEC) 在印第安纳大学正式成立 (Schwerin 1976: 337)⁶⁾。

1961年在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 (Brown University) 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 (the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in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举办的第9届年会上，突出强调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国际性。将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应用于非洲、拉丁美洲和西伯利亚的论文日益增多，研究范围扩展至北美之外。1966年10月7-9日、在承认研究兴趣已经在世界多地区扩展的基础上，在加拿大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具体地点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召开了第14届年会。经会员同意并正式投票，学会名称由“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 (AIEC) 改为“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 (ASE)⁷⁾。更名的主要意义在于，体现了美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进一步联合，展示了研究对象从美国印第安人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土著族群、农民社会及文明社会中的少数族群 (Jennings 1982: 23)。自1966年起，历史人类学的专业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 (ASE) 才正式确立，并延续至今。

由1953年的OVHIC到1956年的AIEC，再到1966年的ASE，可以看出经过战后一段时间的变更和调整，历史人类学的专业学会才得以确立。其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自1953年创办“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 (OVHIC) 起，每年都有一次年会 (托卡列夫 1983: 312)。它是“学术俱乐部”性质的一种组织，倡导跨学科，并不仅限于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姻。这种组织不是国家性 (Parman and Price 1989: 193) 组织，并不十分正规。它没有经费和奖金支持，其作用在于将对历史感兴趣的民族学家、对民族学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及一些倡导跨学科的零散的“吃杂食” (omnivorous) 的学者聚在一起。总的来看，学会成员多数是民族学人类学家、职业历史学家并不多 (Jennings 1982: 23)。可以说，这是当时美国学界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组成特点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历史人类学专业学会的主要特征。

2. 历史人类学专业期刊的创办⁸⁾

随着1953年“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OVHIC)的创建和首届年会的召开,一份相关刊物应运而生。1954年作为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编辑委员会的授权代表(represented on the Editorial Council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OVHIC)主办的期刊*ethnohistory*正式创刊。创刊地即“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OVHIC)的创办地——伊利诺伊州博物馆。该刊物的重要创始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女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沃格林时任“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主席。之后,*ethnohistory*每年出版一卷,至今从未中断(2013年出版了第60卷)。每卷一般包括冬春夏秋四期,其中也有合期出刊的情况。尽管协会在不断更名,但其主办的这份刊物的名字*ethnohistory*一直未变。

1954年*ethnohistory*创刊卷的主编为克诺夫(Richard C. Knopf)。从1955年到1964年,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直由美国女人类学家沃格林任期刊主编。自此之后,主编人选5年为1届(Whitehead 1998: 179),更替不断。其中任职满10年的只有凯琦(Shepard Krech III、从1983年到1992年)和怀特海德(Whitehead、从1998年到2007年)。1955-1964年间,期刊一直由印第安纳大学负责出版,由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心来组织(Composed in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at Indiana Univ.)、由作为美国人类学联合会编辑委员会授权代表的“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OVHIC)及之后的“美国印第安民族史协会”(AIEC)主办(Whitehead 2007: 582)。由此也充分说明历史人类学在战后美国学界的兴起与凸显,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有着相对更为密切的关联。

从1965年到1985年20年间,陆续有一些机构⁹⁾先后承担起该刊物的组织及出版事宜。从1986年到1993年,该期刊被明确宣称为历史人类学的专业学会(即“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ASE”)的正式期刊(official journal),由杜克大学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与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the Newberry Library of Chicago、它有一个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ian))合作,代表学会负责出版事宜。自1994年起至今,该期刊作为“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ASE”的正式期刊由杜克大学出版社代表学会单独负责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讲,杜克大学成为美国学界自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纽伯里图书馆之后的又一个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1954年*ethnohistory*创刊。在1955年卷第1期扉页的显要位置上,明确阐明了本期刊的研究宗旨;1957年又进行了修正;1968年期刊宗旨出现了新的变化;1978年又进行了微调;1982年、1984年出现了新的调整。自此至今、未见有新的研究宗旨明确展示在各卷期扉页上(刘2011)。纵览期刊*ethnohistory*研究宗旨发展变化的历程、可以看出,尽管其明确标示出的研究宗旨在不断调整和修正,但整体风格自创刊之日起就是相对固定的。其一,强调档案材料、民族志和考古学数据的联合使用,强调历史学和人类学方法的联合。其二,研究社会、文化的过程和历史。其三,在美洲土著族群历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后又拓展了研究范围,遍及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社会,但仍以非工业化的土著族群为主。其四,主要刊载实证研究类文章、理论述评类文章和书评。

其作者多来自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史、地理学及其他有关学科,创刊初期以民族学人类学者为主,后来一些历史学者投身其中,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纷纷加盟。无论哪个时期,从总体来看作者还是以民族学人类学者居多。

3. 历史人类学第一个研究中心的形成

作为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作为历史人类学相关学会和期刊的主要创始人、美国女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沃格林 (Erminie Voegelin 1903-1988) 为战后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兴起与凸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在使印第安纳大学成为美国学界第一个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过程之中 (1954-1964)、她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

沃格林和她的丈夫都是人类学家,曾与博阿斯的学生克鲁伯 (A. L. Kroeber) 一起学习过。沃格林的工作主要在于收集民族学数据,而她的丈夫卡尔·沃格林 (Charles F. (Carl) Voegelin) 则从事语言学方面的田野调查。一个名叫莉莉 (Eli Lilly) 的考古学家对沃格林夫妇的职业生涯有过重要的影响。在莉莉的直接影响下,沃格林对肖尼人 (Shawnee) 发生了兴趣,并将肖尼人作为其田野调查对象。肖尼人是一个早年居住于坎伯尔部分地区和俄亥俄山谷中部的土著美洲民族,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在抵抗白人移居俄亥俄山谷时发挥了突出作用。1939年沃格林成为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第一个女博士。其博士论文就是有关肖尼人丧葬习俗 (Shawnee Mortuary Customs) 方面的研究,五年后以专著形式由印第安纳历史学会 (the Indiana Historical Society) 出版。另外,她在编辑出版人类学、民俗学及历史人类学方面的报告和著述时也有重要贡献 (Tanner 1991: 61-62; 68)。1941年秋、印第安纳大学成为沃格林夫妇的永久性职业基地 (Tanner 1991: 63)。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在1940年代早期就已体现在它宣布的新课程之中。印第安纳大学第29号 (1941年8月) 时事通讯 (Indiana University News-Letter 29 (August 1941)) 全面诠释了该校人类学广泛的研究兴趣:“人类学一般分为三个主要的分支:体质、文化和历史。其中,第三个分支是指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自然和社会现象。在研究没有文字及书面记录的未开化民族时,人类学有时与史前史是同义语,因此人类学被视为历史学科 (而不是科学) 的一种扩展” (Tanner 1991: 64)。沃格林在印第安纳大学最早的学术职位始于1943年。当时她在人类学系做为期一年的兼职教师。后来又被任命为为期两年的荣誉会员,接着做访问教师 (visiting instructor), 1950年成为人类学系的访问讲师 (visiting lecturer)。二战期间她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了很多门课程。在1942年和1943年她还成为军队特训计划 (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中教授野外技术的讲师。在随后的1943-1946三年中,她一直教授人类学学科的课程。1941-1946年间她还是美国民俗期刊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的主编。1947年3月她的丈夫被任命为印第安纳大学新组建的由考古学家莉莉赞助和支持的人类学系主任。1947年4月13日正式宣布沃格林夫妇共同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 (Guggenheim Fellowships)。这笔款项使沃格林对美国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口头历史和神话的相关研究得以进行,这也标志着她在一般的民俗学领域中的特殊兴趣。1948年她成为美国民俗学

会 (the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的会长和终身会员。1949-1951年她一直是美国人类学联合会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 的执行秘书; 而此一时期正是该组织要求变化的时期。1950年她还接受了芝加哥民俗学会奖 (Chicago Folklore Society Prize), 并被任命为美国高级科学联合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的会员 (Tanner 1991: 64-65)。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早在二战期间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就曾向联邦司法部提出、通过拨付相应的经费, 在印第安纳大学设立俄亥俄流域-大湖区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项目。这项要求在战后得到满足, 印第安纳大学因而成为最早的印第安人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心之一 (张 2005: 80)。1946年印第安权利申诉委员会 (Indian Claims Commission) 的建立以及1953年印第安纳州大学与司法部合作的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 (the Great Lakes-Ohio Valley Research Project) 出台, 引起了时在印第安纳大学任职的沃格林夫妇研究兴趣的变化 (Tanner 1991: 65)。

北美印第安人土地占有概念和对土地的实际使用、在本质上与西方人的概念和实践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对美国印第安各族群的文化、印第安各族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印第安各族群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Voegelin 1954b: 170)。在此基础上、司法部与印第安纳州制定合约、准备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 (Bloomington) 进行长期合作、在大湖区从事更为直接的历史研究 (Tanner 1991: 65)。该项合作、即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是一项由印第安纳大学人类学系承担、为美国司法部所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该研究计划始自1953年秋、初步设计为期三年、以人类学者为主。作为该研究计划的实际负责人之一、沃格林认为、该项研究需要史学家的介入、需要这两个学科的合作、也有赖于能够搜集到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相关材料 (Voegelin 1954b: 166-171)。在刚开始的3年内 (1953-1955)、印第安纳大学任命沃格林的丈夫为该计划主任、沃格林为副主任。作为合作研究活动的一部分、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和人类学系的学生、都参加了进来 (Tanner 1991: 65)。随着该项研究计划的进一步扩展、1956年一项新的政府合同 (即扩展的中西部印地安历史调查、隶属于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 生效。同年、沃格林被任命为该研究项目的主任、这也是她独立学术生涯的开始 (Tanner 1991: 65)。

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的研究范围, 主要在美国的西北部地区、即、从俄亥俄流域的西北部一直向西拓展到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 有16个印第安部族成为研究的主体对象 (Tanner 1991: 67)。同时, 该研究计划还导致了各种按照年代序列编排的档案文件的产生。在为该研究项目搜集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建立了地方图书馆 (张 2005: 80)。在沃格林的指导下, 收集这些印刷的或手抄的档案等工作在系统持续地进行。从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亨廷顿图书馆, 都成为这些资料的集散之地。据有关统计, 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生产了34项研究报告, 为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从事相关工作提供了历史背景。这些研究报告和档案文献相应成为重要的法律依据。该计划的有关材料在印第安纳州大学考古学系的格伦·布莱克 (the Glenn A. Black) 实验室中收藏。这些档案被称为 the Ohio Valley-Great Lakes Ethnohistory Archive。出于某种原因档案部分名称得到调整, 即把该研究计划题目中的“大湖区-俄亥俄流域”转换为“俄亥俄流域-大湖区” (Tanner 1991: 67-68)。可以说, 沃格林为该项研究计划的具体实

施有着突出的贡献。

1956年沃格林成为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教授。她在历史系开设的北美印地安人历史的课程, 对于国家的历史课程 (the history curriculum of the nation) 而言具有先导性意义, 为历史系如何开设历史人类学等相关课程提供了模式和先例。始于1957年的这两个学期的课程, 由沃格林来讲授连续进行了三年, 在1962年重复开设。这些课程实际上是美国历史系中最早和最正式的历史人类学课程。由此也可看出, 当时历史人类学的有关课程最初开设在大学历史系里, 但由人类学家来教授 (Tanner 1991: 66)。

作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教职人员, 沃格林的兴趣主要在课堂教学, 但她的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印第安纳大学与司法部合作计划、即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 (the Great Lakes-Ohio Valley Research Project) 的管理和研究之中。1955-1964年她还持续编辑了由印第安纳大学组织并出版由“俄亥俄流域印第安历史协会” (OVHIC) 及之后 AIEC 主办的期刊 *ethnohistory*。这个时期也是印第安历史研究主题覆盖地理区域扩展的时期。沃格林自己的名字很少出现在 *ethnohistory* 刊物中 (Tanner 1991: 66), 但在1954年 *ethnohistory* 创刊号第1卷第2期上, 她发表了专题研讨文章 *An Ethnohistorian's Viewpoint*, 首次对历史人类学进行系统阐释和界定 (刘 2011)。“沃格林的远见卓识、革新技术和热情, 为正式的历史人类学及有关组织、期刊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Spores 1978: 204)。

沃格林的职业生涯事实上也终止于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之中。她最后一次在印第安权利申诉委员会 (Indian Claims Commission) 中作证是在1969年夏天、即涉及一项签署于1795年的有关“Treaty of Greenville”的复杂案例 (Tanner 1991: 68)。

综上所述, 印第安纳大学是战后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的主要执行者, 也是1950-60年代历史人类学学会和期刊的大本营和主办地。事实上, 印第安纳大学上已经成为战后历史人类学凸显于美国学界的第一个研究中心。这与政府部门的支持、印第安纳大学自身拥有的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良好的学科互动传统、尤其是沃格林等为代表的教职人员的诸多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4. 历史人类学经验研究的历史过程化

相比二战之前, 二战之后至1970年代的历史人类学, 除了其概念诠释空间不断扩展之外, 相关的经验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研究的历史过程化上。

这一时期历史人类学的很多经验研究作品问世。其中, 尤勒 (Robert C. Euler) 的《民族志方法论: 来自南派尤特人的文化变化、信息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一项三维度时间研究》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 A Tri-Chronic Study in Culture Change, Informa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rom the Southern Paiute*), 突出反映了该阶段历史人类学经验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涉及到的主要问题。该文最初写于1959年12月, 是墨西哥城举行的美国人类学联合会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 1959年年会上的一篇参会论文。后经简要修改收入了1967年版的

Americ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论文集之中。作者尤勒是盐湖城犹他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热衷考古学、民族志及历史人类学研究，对美国西南地区尤为关注 (Euler 1967: 61)。

在此文中，尤勒一方面指出作为美国学界的一项研究技术，历史人类学在《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法案》的促动下，在过去的20年间里 (1946-1967) 获得了很大发展。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及那些好不容易才转变为历史学家的人类学家，在对许多美国印第安人和其他社会土著文化史的重构之中，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在取得上述成就的过程之中，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们检查了历史档案资源、口述传统和民族志研究 (这些民族志研究、主要由具有博阿斯传统的研究者所从事)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Euler 1967: 61-62)。另一方面，尤勒又认为目前依然有必要提出“由现在的土著信息员所提供的口述传统知识，是不是可靠？当追索与印第安人有关的由早期欧洲旅行者和探险家留下的档案文件时，是不是在进行历史的或历史人类学研究？”这样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在田野中进行研究的民族学家仍然很少对此进行检视，也在于学界越来越重视历史人类学与历史学、历史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 (Euler 1967: 62)。尤勒借助经验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作答，由此也展示出了他对历史人类学的基本认知。

检验档案材料、口述传统和民族志材料等各种材料资源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并充分加以综合利用，同时配以文化过程的理论，是尤勒心目中理想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种类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民族学、人类学家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1956到1959年尤勒对美国西部大盆地地区的南派尤特人 (Southern Paiute) (美国印第安人的一部族，居住在南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北部及加利福尼亚东南的邻近地区、被称为南派尤特人) 进行了历史人类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这项研究先由美国司法部所倡导，后由美国哲学学会彭罗斯 (Penrose) 基金提供赞助，体现了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技术的联合，共涉及了三个不同的时间维度 (Euler 1967: 62-63)。

第一个时间维度：尤勒收集到的许多历史材料来自南部派尤特部族以及他们在犹他、亚利桑那、内达华的部分居民，时间跨度在1776-1875年的一百年之间。这些历史材料是尤勒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时间维度的材料。

第二个时间维度：191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家萨丕尔 (Edward Sapir) 根据100多页的田野笔记整理出了一部详细的有关南部派尤特人的民族志。萨丕尔的信息调查员 Tony Tillahash，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学生，在 Carlisle 印第安学校就读。从1910年1月到6月萨丕尔和他的信息调查员一起在宾夕法尼亚从事研究工作。据 Tony Tillahash 的家庭背景情况，萨丕尔认为自己从 Tony Tillahash 那里得来的调查数据、与印第安土著文明与欧洲发生接触碰撞时期及之前时期的生活有关。这些材料一直没有出版，而由施皮尔 (Leslie Spier) 来保存。1956-1959年在尤勒的调查研究过程之中复印了这些笔记，并建议进行编辑和出版 (Euler 1967: 63-64)。1910年萨丕尔的研究 (即关注印第安土著文明与欧洲发生接触碰撞时期及之前时期的研究) 所涉及的材料和成果是尤勒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第二个时间维度的材料。

第三个时间维度：从1956年到1959年尤勒所从事的现在时田野调查是其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

的第三个时间维度。在此过程之中,有幸与萨丕尔半世纪之前相同的信息调查员一起工作。当时 Tony Tillahas 已经70多岁了,但依然是一个行动敏捷的人。他们共同详细地查看了萨丕尔当年的田野数据。当然,信息员 Tony Tillahas 并不知道尤勒拥有这些笔记。另外,尤勒还从15个年长的南部派尤特人那里获得了一些口述材料 (Euler 1967: 63-64)。

尤勒认为,处在三个不同时间维度中的材料为研究派尤特人增加了科学的知识。有了这些知识就可以对信息源的有效性、可靠性进行讨论,并从中得出相对客观一些的结论。尤勒还指出,人类学家的科学概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著信息员的口头讲述。

将第一时间阶段之中的档案记录与后两个阶段之中的口述材料进行对比,尤勒的结论是,信息员陈述的有效性,限于他们所阐述的土著文化从整体上消解之后的40-60年间(超过这个时间范围则很难适用),限于从一般意义上来讨论文化变迁。将1910年与1956-1959年的来自同一个信息员的口头陈述进行对比(即将第二、三时间阶段中的口述材料进行对比),他的结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信息员是可靠的,从整体上来看,文化是稳定的 (Euler 1967: 64)。

将这三个时段的数据进行排列和分析,尤勒还得出了如下见解:

其一,1776-1875年的早期记录(涉及到第一个时间维度)主要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军人、旅行者等,很多都含有民族中心论的特色。对其进行检查,主要从文化和文化变迁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仅仅从历史描述和叙述的角度出发,这样可以更多地了解印欧文化接触碰撞的性质 (Euler 1967: 65)。

其二,民族学家所记录的社会政治数据基本上反映出了印欧文化接触碰撞后土著生活的客观画面。1910年萨丕尔的记录,亦即尤勒1956-1959年期间所主要使用的历史档案材料,在尤勒看来有96%是可以赞同的。也就是说,18-19世纪狩猎者、士兵、定居者、传教士、以及一些民族学家所描述的历史、与萨丕尔所描绘的南部派尤特文化特质和类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土著生活的客观反映。同时也表明,文化涵化主要是在社会-政治氛围中完成的 (Euler 1967: 65-66)。

其三,来自土著的口述材料一般是可靠的。土著以往的口述与今天的信息员的陈述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和持续的。Tony Tillahas 在1910年所做的陈述,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印欧接触碰撞及之前的条件。Tony Tillahas 在1956年和1959年所做的涉及相同主题的详细陈述,经尤勒分析,92%是相关联的,另外4%的数据 Tony Tillahas 则表示出犹豫。但经过谈话互动和回忆, Tony Tillahas 基本上给出了早期回答萨丕尔时一样的答复。也就是说,加起来96%的数据经历了半个世纪丝毫未变。剩下的只有4%的数据, Tony Tillahas 给出了负面的回答,而这4%也不一定就与他先前的陈述矛盾,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记忆错误,也有可能是由于信息员在很长的时间跨度中对这些小问题的兴趣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因为他不可靠。这种兴趣变化是重要的,而这往往为民族志学家所忽视。1956年已经年长的信息员的兴趣,可能与他1910年年轻时的兴趣有所不同。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人是一个不寻常的信息员,他持续保持着对过去的兴趣,能够记住曾经给过萨丕尔的那些陈述。这种状况有可能与当年萨丕尔对他的训练有关。正是这种训练使得这个信息员对当地的文化史保持了足够兴趣。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实例事实上充分显示了土著口述材料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Euler 1967: 66-67)。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历史人类学研究者也都强调了历史过程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历史人类学(应该)是对文化或文化过程理解的一种发展,它依靠使用一种具有历史性质的协议,即通过时间来分析人类集团的行为,它基于现代民族志调查的范畴,更适合于那些超越作者原初目的的分析”¹⁰)。这种见解事实上已经构成当时学者们从事历史人类学经验研究、构建方法论和理论假设的基础 (Euler 1972: 201)。

从上述的尤勒展示的经验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尤勒不仅强调历史过程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更为关注在此基础上将文化过程的理论假设和历史重构关联起来,依据文化过程来分析和确定口述传统和档案的有效性,以及强调多种时间维度、多种历史材料在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Euler 1972: 201)，“分析或者仅仅记录了一种历史叙述的数据。尽管它可以是一种族群(ethnic group)的历史,但还不能成为历史人类学,直到它涉及了文化过程的理论,以图处理上面所提到的有关南部派尤特人的全部历史数据”(Euler 1967: 67)。

可以说历史过程化成为这一时期历史人类学经验研究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历史人类学区别于传统民族志的主要表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研究类型已经清晰显现出来。

结语 历史人类学兴起于美国学界的一般特点及影响

作为历史人类学专业学会和期刊的主要创始人、美国女人类学家沃格林在 *An Ethnohistorian's Viewpoint* 一文 (*ethnohistory* 1954年(创刊卷)中,对该时期历史人类学的一般特点进行了具体总结,集中体现了当时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对这种研究类型的基本看法。

其一,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既存在着学术上的基本分野,也存在着互补的可能性。沃格林认为,战后以来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尽管有交叉和联系,但存在着基本性的学术分野。民族学家描写文化,同时根据模式、结构以及生长变化等概念来分析文化。而有关文化生长和变化等动力问题一直是文化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其中有些学者还使用长时段的术语,即在长时段中来历史地重构原始社会的文化史(culture-history)。尽管有些民族学家拒斥起源问题,但他们也谈论历史重构问题 (Voegelin 1954b: 166)。沃格林指出,从名称上看,ethnohistory 兼有民族学和历史学含义,涉及了两个学术学科,即民族学和历史学。但当时的状况是,人类学家很少接受历史学的训练,很少涉足历史领域,无论是一般领域还是特殊领域。有历史思想的民族学家们(historically minded ethnologists)需要从历史学家那里学来的不仅仅是档案资源,也需要学会如何在他感兴趣的特殊领域来使用这些原始材料以及有关的技术和方法,需要和职业历史学家建立联系。从理论上讲,历史学也会对人类学家的理论假设感兴趣;从实践层面上讲,人类学家所要求的民族志知识,也引发了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在沃格林看来,尽管当时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并不很大,但目前民族学与历史学的联系已经开始,始于1953年由印第安纳大学与司法部合作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计划(即大湖区-俄亥俄流域研究计划)的实施即为具体体现 (Voegelin 1954b: 166-171)。

其二, 历史人类学研究重视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较为关注由非土著提供的档案证据。沃格林指出, 由欧美游客、传教士和军官、以及印地安事务局职员、商人等留下的书面的原始材料, 四百年来已经累积了很多, 形成了有关北美印第安文化研究的基本档案材料。对一些北美土著文化研究而言, 历史资源已经很丰富了 (如对 Shawnee 肖尼人的文化研究); 对另外一些北美土著文化研究而言, 又相对有限 (如对 Tiibatulabal 人的文化研究) (Voegelin 1954b: 168)。历史人类学需要何种类型的档案资源信息? 沃格林认为这很难回答。因为有些历史人类学研究十分广泛, 有些只聚焦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但是, 历史资源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是重要的。要把一些变化问题搞清楚, 就必须使用档案资源 (Voegelin 1954b: 169)。战后初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多与印第安人权利申诉委员会 (Indian Claims Commission) 之前的土著土地占有案例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法律背景下的、以非土著的学者提供出来的档案历史证据, 而不是依靠来自土著的口述材料 (Shepard 1991: 347; 1996: 423)。这种对由非土著提供的档案的重视受到了1970年代以来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的批判, 这也是197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得以新的拓展并日渐繁盛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此外, 在笔者看来, 组织松散、缺乏学科规范、不为学界特别看重也是战后历史人类学兴起于美国学界的一般特点。虽然历史人类学的专业学会每年都召开年会, 但它并不是一种十分正规的国家性组织; 尽管 *ethnohistory* 是历史人类学专业学会主办的正式期刊, 但它并不是美国国内的一流刊物。可以说, 有不少学者尤其是职业历史学者, 对学会及其期刊并不看重 (Parman and Price 1989: 193)。尽管如此, 战后至1970年代作为一种学术现象, 历史人类学无论在概念上, 还是在经验研究方面毕竟取得了初步成就, 为1970年代之后历史人类学的日渐繁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可能。

经历了半个世纪 (20世纪上半叶) 的长期孕育之后, 作为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和具体表达方式, 历史人类学于二战后的1950和1960年代逐渐兴起于美国学界。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兴起, 折射出西方历史人类学肇始与发端的基本特点, 成为西方历史人类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展示窗口。

注

- 1) 从目前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来看, 国内学界对 *ethnohistory* 这种学术现象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研究, 在涉及 *ethnohistory* 等相关概念的翻译及使用问题上, 缺乏统一认识, 存在着混杂多样的现象 (刘 2011年第2期)。笔者认为, *ethnohistory* 是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和具体表达方式 (刘 2013b: 37-56)。为此, 本文暂时将 *ethnohistory* 翻译为历史人类学, 供学界评判和指正。
- 2) *The History of OVHIC, Ethnohistory, Vol. 1, No. 1. (Apr., 1954), pp. 4-6.*
http://www.jstor.org/stable/480885?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2017年6月24日阅读。
- 3) *Program of the 1953 Meeting, Ethnohistory, Vol. 1, No. 1. (Apr., 1954), pp. 7-8.*
http://www.jstor.org/stable/480886?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2017年6月24日阅读。
- 4) *The Constitution and By-Laws of the Ohio Valley Historic Indian Conference, Ethnohistory, Vol. 1, No. 1.*

(Apr., 1954), pp. 11-14.

http://www.jstor.org/stable/480888?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2017年6月24日浏览。

- 5) *Notes on the Business Meeting*, *Ethnohistory*, Vol. 1, No. 1. (Apr., 1954), p. 10.
- 6) 但 J. Axtell (1978: 112) 和 R. Euler (1972: 203) 均认为 “the American Indian Ethnohistoric Conference” 成立于1954年, 这可能是 J. Axtell 和 R. Euler 的笔误。事实上应为1956年。参见 *ethnohistory* 期刊1955年卷各期的封皮和扉页。
- 7) Tanner 认为是在1964年年会上更名 (Tanner 1991: 66), 可能属于印刷错误。笔者赞同在1966年年会上更名的说法 (R. Euler 1972: 204-205; Schwerin 1976: 324; Axtell 1978: 115; Jennings 1982: 23; Brown 1991: 121; Shepard 1991: 347, 1996: 423)。
- 8) 这里以 *ethnohistory* 期刊由创刊至今的发展进行概览, 并不完全限于 *ethnohistory* 在美国学界日渐凸显与兴起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
- 9) 如 the Special Typing Department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Publication Services, Inc., Tempe, Arizona.;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 等。
- 10) 本段话出自1959年 Henry F. Dobyns 的一份名为 “Ethnohistory” 的未刊手稿 (Euler 1972: 206)。

参考文献

(中文)

刘海涛

- 2009 “美国 [民族历史学] 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出站报告。
- 2011 “对西方学界 *ethnohistory* 一词的历史考察” 《民族研究》(2): 32-43。
- 2012 “二战后 *ethnohistory* 凸显于美国学界的动因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pp. 49-68。
- 2013a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的 *ethnohistory*: 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有益补充”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3): 1-7。
- 2013b “Ethnohistory: 西方 “历史人类学” 的一种具体表达 —— 以西方学界对 *ethnohistory* 一词释义的历史考察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pp. 37-5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托卡列夫, 谢·亚 (Токарев, С. А)

- 1983 《外国民族学史》著、汤正方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沃什布恩, 威尔科姆·E. (Washburn, Wilcomb E.)

- 1997 《美国印第安人》陆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张友伦

- 2005 《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北京: 人民出版社。

(英文)

Axtell, James

- 1978 The Ethnohistory of Early America: A Review Essa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5(1): 110-144.

Brown, J. S. H.

- 1991 Ethnohistorians: Strange Bedfellows, Kindred Spirits. *Ethnohistory* 38(2): 113-123.

Euler, R. C.

1967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A Tri-Chronic Study in Culture Change, Informa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rom the Southern Paiute. In C. L. Riley and W. W. Taylor (eds.) *Americ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Leslie Spier*, pp.61-67.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2 Ethno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thnohistory* 19(3): 201-207.

Faubion, J. D.

1993 History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2: 35-54.

Jennings, F.

1982 A Growing Partnership: Historians, Anthropologists and American Indian History. *Ethnohistory* 29(1): 21-34.

Lurie, N. O.

1961 Ethnohistory: An Ethnological Point of View. *Ethnohistory* 8(1): 78-92.

Parman, D. L. and C. Price

1989 A "Work in Progress": The Emergence of Indian History as a Professional Field.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20(2): 185-196.

Shepard, K.

1991 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 345-375.

1996 Ethnohistory. In L. David and M. Ember (eds.)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2: 422-429.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Spores, R.

1978 Ethnohistory in Middle Age: An Assessment and a Call for Action. *Ethnohistory* 25(3): 199-205.

Schwerin, K. H.

1976 The Future of Ethnohistory, *Ethnohistory* 23(4): 323-341.

Tanner, H.

1991 Erminie Wheeler-Voegelin (1903-1988), Founder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 *Ethnohistory* 38(1): 65-68.

Voegelin, E. W.

1954a A Note from the Chairman. *Ethnohistory* 1(1): 1-3.

1954b An Ethnohistorian's Viewpoint. *Ethnohistory* 1(2): 166-171.

Whitehead, N. L.

1998 Editor's Statement. *Ethnohistory* 45(2): 179.

2007 Editor's Introduction. *Ethnohistory* 54(4): 582.